



# 行走 倾听 书写

□尼玛潘多

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自己有诸多的不满意,其中最不满意的就是性格。一个羞涩内向的人和这个喧哗的社会,和周遭热闹的人群完全不搭调。有些人先接触了我这个人,再了解到了我的职业,便会一脸讶异,以至于我自己都深信沉默寡言的人,不配从事记者这样的职业。然而,职业的抉择并不如逛街挑衣般简单,在别人的不解中,我倔强地做着沉默的记者。然而,我庆幸我的沉默并不是沉默,我倾听我也思考,透过一些听到的故事,我用小说的方式,试着探询生活的本真,竟也获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

然而,我想乘着小胜有所作为时,接受采访任务,进行采访写作,完成采访任务,工作就这样周而复始地占据我所有的时间,甚至我的节假日,原定的创作计划搁浅下来。我忍不住抱怨这份工作,抱怨它除了忙碌,没有带给我任何的好处。但是有一天,我把自己关在书房读着自己的小说时,突然发现,我写的每个人物,几乎都来自那些忙碌地倾听与行走的日子,那些神态语气无不印着某个采访对象的身影。我突然感谢自己有过一段当记者的经历,为自己坚持没有错过这个职业而庆幸。

记者这个职业让我走遍了西藏大地,看见了许多风光,认识了形形色色的人,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人生与心境,他们和他们生活的地方成为了我创作的养料。还深深地记得一年夏天,我在一个叫作地纳的小村庄,参与一个口述史的课题。我住在村民家里,用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听着那些泛着泪光、露着微笑的人生。他们的生活和我离得很远,但每次的讲述却让我感觉彼此亲近了许多,他们毫无保留的信任与鼓励,让我产生了创作冲动,一个叫“协噶尔”的村庄在我的小说里诞生。在藏语里,“协噶尔”有白色水晶之意。我希望让一个个小人物,在这样一个玲珑剔透的村庄里出场,形成一个系列小说,让读者从他们的故事中看到自己。

去年,我的长篇小说《紫青稞》制作成广播节目连续播出后,一位听众托朋友捎来一句话:“向您表示最诚挚的谢意,这是我迄今听到的离我们的生活最近的小说。”后来,我又得知这是一位年近80、近乎丧失视觉功能的听众,我感动于他这番评价之余,又为自己为一个孤独的老人创造了一段美好的时光而自豪,那些行走倾听的日子,显得更加珍贵。

在两种语言间行走,的确是个费力的活儿,为了在汉语语境中,为一句藏族俗语找到一个贴切的词语,我也得磨上很久很久,所以,我的小说总是写得很慢,但我始终相信自己,不停地行走,不断地倾听,会让更多的人走进我的小说,经我慢慢地雕琢、刻画,他们会自己鲜活生动起来,走到读者跟前去,让读者认识千姿百态的藏人,他们不光只是咧嘴大笑与磕着长头的样子。



尼玛潘多,藏族,鲁迅文学学院第八届、第二十八届中青年作家高研(深造)班学员,供职于西藏日报社,现为西藏作协副主席。作品曾刊于《文艺报》《民族文学》《长篇小说选刊》《作品》《国家地理杂志》《西藏文学》等,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文。有作品曾入选《追寻她们的人生》《中国城市巡礼》《西藏行吟》《西藏的女儿》及民族文学杂志社成立30周年优秀文集等。出版有长篇小说《紫青稞》,并被翻译成藏、英文出版;散文集《云中锦书》。曾获第六届西藏珠穆朗玛文学艺术奖、《民族文学》年度小说奖。

## 高原上的紫青稞——评尼玛潘多的小说创作

□徐琴

在当代藏族女性作家中,尼玛潘多可以说是十分独特的一位。她以遒劲绵密的现实主义文笔,深入地描绘西藏农村的生活,揭开了惯常阅读中神秘魔幻的西藏的面纱,让我们了解到了西藏的世俗生活,触摸那尚未被触摸的灵魂。

尼玛潘多童年时期跟随父母生活在日喀则郊区的农场,从小对农村的生活有着深入的了解,因此,藏东农村生活在她的文本中娓娓道来,毫无违和之感。因为是报社记者,她又天然地对一些重大的题材保持着敏感。工作的繁重使她的创作并不是很多,然而从这些作品中,也可以窥到尼玛潘多独特的写作质地。

首先要谈的是尼玛潘多的《紫青稞》。女性作家天然地关注女性的命运,尼玛潘多也不例外,她的一系列作品大抵可以被称为“女性之书”,然而她又将女性纳入时代的进程,将鲜被关注的西藏农村变革纳入文学史,这可以说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西藏虽然处在祖国的边疆,传统文化和宗教思想在人们的观念中起着根深蒂固的作用,但改革开放的潮流也在不断洗涤着旧的一切。现代文明与古老传统的强烈碰撞,新的时代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多种文化碰撞的冲突和女性自身主体意识的日益加强,使得现代化进程中藏族女性的生存环境、生存结构及个人境遇和追求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改变,由此整个藏族女性文学的潜在发展轨迹、创作主旨以及创作技巧等方面都有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面对现代文明与古老传统的冲突,面对时代巨变和民族传统中因袭的负累,藏族女性作家往往能够直面民族前行过程中的悲欢,侧重于对本民族文化的探求与追寻,力图以自己的创作重构新的民族文化精神;另一方面,女性作家从女性特异的性别视角出发,以敏感细腻的心灵对现实世界进行独特的体验,并将女性的性别体验上升到对民族生存经验的体认,在其作品中反映藏族女性在社会嬗变过程中女性意识由懵懂到自觉的过程。

尼玛潘多的长篇小说《紫青稞》就是这样一部描写广阔社会生活面,对本民族女性生存状态进行探寻和思考,充满历史厚重感和鲜明女性意识的优秀之作。它以当代西藏农村儿女的命运变迁、曲折情路为中心,展开了对现实世俗生活的真切描写,为我们呈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转型期西藏社会真实的一面。面对藏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也要经历的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对立冲突,尼玛潘多既没有一味去美化乡村,对城市文明持批判态度,也没有片面地高扬现代化的旗帜,去批判农村的不合时宜,而是将现代化过程中乡村的变革放在普通人的生活中去呈现,通过藏家儿女的悲欢离合展现时代的风潮。

《紫青稞》以宏大的时代转变为背景,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去看待藏民族前行过程中艰苦的蜕变,以一种理性精神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进行新的审视。“紫青稞”在作品中充满了象征色彩,代表的是一种苦难、一种坚忍、一种生命的顽强。“普村是嘎东县各自然村中,离县城最近的村庄,这里恶劣的自然条件,使紫青稞这种极具生命力的植物,成为这里的的主要农作物。”这里的自然条件是那样的恶劣,然而这里却洋溢着最热烈的生命力:“只要男人的扎年琴弹起来,女人的歌声就

会和起来,连足尖也会舞蹈起来。无论日子多么窘迫,他们的歌声从来没有断过,他们的舞步也从没停过。”正是在这样一种刚健的民族精神的哺育下,普村的男男女女从来都是达观地对待生活,即使是洪水冲毁了家园,他们也会很快从困苦的阴影中走出,放声歌唱。藏传佛教和民族传统精神中的粗犷豪放使藏族人能够达观地对待生命中的苦与乐。然而,这里仍然有许多阴霾,在贫瘠的普村,传统的等级制度还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在旧西藏,铁匠被认为是罪孽深重之人,是黑骨头,因为他们炼制各种器械,而这些器械常被用于杀生和战争,而佛教认为杀生和屠戮是罪恶的,所以铁匠在旧时地位十分低下。旧西藏通行了几百年的《十三法典》《十六法典》,明确规定铁匠属于下等人,其命价为一根草绳。铁匠的子女也被认为血液不干净,因此世代被人瞧不起。罗布旦增爱上了铁匠的女儿措姆,思想传统的阿妈曲宗坚决不答应,她认为自己一家虽然日子过得紧,但“在村里算得上是有‘身份’的人,是能和其他村民共用一个酒碗喝酒的人;而铁匠扎西这几年靠手艺挣了一些钱,家境不错,可毕竟出身低贱,村里没人跟他们共用一个酒碗喝酒,这是明眼人有目共睹的事情。”根深蒂固的血统等级观念,使得阿妈曲宗不能接受铁匠的女儿,罗布旦增为了爱情,出走到来措姆家。也正是因为作为家庭顶梁柱的罗布旦增的出走,阿妈曲宗由此渐趋破败,也让每个家庭成员内心埋上了阴影。达吉爱着铁匠的儿子旺久,只好把这种情愫潜埋于心底。桑吉爱着出身高贵的多吉,也因为哥哥的婚事而受到影响,“如果不是大哥突然住进铁匠家,执意要做铁匠的女婿,强苏家没有理由拒绝他们的婚事;但现在可以了,一个高贵家族怎能接受和铁匠家沾亲带故的媳妇。”阿妈曲宗家儿女的悲剧情感由此拉开序幕。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样一种传统的等级制度和血统观念,也逐渐在现代文明与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开始动摇,旺久凭着自己的精明能干在生意场上如鱼得水,得到了人们的尊敬,出身与血统不再成为一道屏障,作品写普拉“亲眼看见旺久身边的人是如何巴结旺久的,假如旺久喝酒,那些人一定会争着和他共用一个酒杯……”旺久的精明能干,豁朗大度,也使达吉有了坚固的依靠。虽然与普拉结婚,但旺久却一直驻留在达吉的心中,而普拉好高骛远、狭隘猜疑,最终失去了达吉。固守传统观念的阿叔也因为旺久的能干热情而对旺久十分感恩,连小妹妹边吉也对旺久充满敬意。而与旺久相对的是多吉,他虽然血统高贵,然而却好逸恶劳,品性龌龊,风流成性,辜负了深爱他的桑吉,到最后人人厌恶唾弃他,还被抓进了公安局。可以看出,在社会转型期,传统的门第观念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年轻一辈虽然依然受血统观念的影响,但逐渐走出历史的禁锢,在情感的世界里开始向自由的天空翱翔。

此外,作品还通过城乡对比,通过森格村与普村的对比,来揭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城乡差别。普村的人羡慕住在城边的森格村人,森格村人天然地对贫困的普村人有种优越感,但森格村人却对县城怀着一种敬畏的心理。“达吉也一样,喜欢看县城里的花花绿绿,喜欢县城繁华的样子,和别人不同的是,她还喜欢县城的名分,生活在县城附近,她觉得自己也变得高贵起来。”对城市的向往与追求,实质上是对现代文明的追求。然而,强大的城乡差别,使得我们的乡村儿女倍感压抑。桑吉到了城里,感受到的不是城市的温暖而是城市的冷漠,“城市再

## 她静出了一种声音

□贺小晴

■印象

看见尼玛潘多的第一眼,你肯定不会与她搭讪。不是因为她沉默,而是因为她的沉默传达给你一种信息,她是不需要跟你说话的,你若开口,要么打扰了她,要么很可能自讨没趣。

后来开会相互介绍,她说:“我叫尼玛潘多,来自西藏。大家可以叫我潘多。”除却必要的信息,没有多出一个标点。我便仍以为她安静着,几近无话。只是,她的声音轻微明亮,与她的沉默形成强烈反差。于是,潘多的名字便记住了。

许是她安静得彻底,倒给我一种踏实的感觉。仿佛人虚弱时,要靠住墙。在这个新加入的环境里,人无论自觉不自觉,都在下意识辨识气场,靠近同类。我们的对话是从电梯里开始的。狭窄的空间里,灯亮着,彼此都不得不靠近。我便问她饭菜可合胃口,她说挺好,已经长了四斤了。我哇哇叫,为她的“收获”表示担心。她的反应倒很平淡,又多少有些模糊的担忧。我们便约好一起走路。

那天起,每到黄昏,我的电话准时响起。我们在电梯口碰面,一起下楼,一起穿过大厅,钻进黑口袋般的夜色里。在夜色里极快地走,我们彼此无话。但我知道,我的无话是因为步子急,顾不得说话,潘多的无话则是安静,是她的本意。奇怪的是我一点也不觉得沉闷、压抑,反倒觉出了一种异样而由衷的舒服。

走得久了,话自然有,却不是无话找话。那时候我从未读过潘多的文字,对她的写作一无所知。但我知道她的《紫青稞》,出版之后受到强烈关注。我便提到许多写西藏的书,那些“拉飘”“藏飘”什么的,印象中,只要在西藏驻足过,就能写出几本漂亮的书,有些还挺卖座。便问她的小说都写什么,她轻淡地说,她写的是她认识的西藏,一个真实的生活着的西藏。

我仿佛知道她在说什么,又不甚明白,却不多问,因为深知她是一个很难得用嘴把事说深说透的人。

然而用行动,她却能将事做到让你傻掉的份上。那天接到潘多的电话,确知我在,说要过

来,并不说原因。打开门,她提着一只大纸袋,进门来,纸袋里又是两只大盒子。她将盒子一边往外拿,一边说,她去超市了,买了一些五谷杂粮,磨成粉。都是现磨的,而不是现成品。我惊得不轻:你去现磨的?她不接话,只道,担心味道不合胃口,又买了一盒伴侣。她指着那只粉红色的盒子说,这盒是伴侣,吃杂粮粉时,拆一包和上,味道好些。我定定地看着她。她又道,依然的轻声细语:知道你不吃晚饭,给你买了这个。我不再看她。却不知看向哪里。难得地感到一股潮水,无中生有冒出来,往眼里涌。

学校要外出社会实践,事先统计谁和谁住,我便和潘多互看一眼,心领神会。真同了寝室,我们依然极少说话。除却偶尔一两句家常,别的我们更没聊过。名也好,利也罢,作者常有的那些情绪,那些烦恼困顿焦虑期待……在她从不涉及,好像压根就不存在。俗世中的话题在她不必多言,俗世之外的话题又似乎无从说,无需说。于是只剩下沉默和意会,以及一些简短必要的日常用语。然而,分明地,我又听见了她那墙一般厚重结实的沉默背后,有着细小的、隐约的、潺潺的声音。

感觉很快应验。有一次,聚会上,酒惹翻了情绪,大家手舞足蹈。潘多毫无悬念地静坐着。终于大家要她也来一首,唱个藏族民歌什么的。潘多的眼里开始闪动,光由星星点点,汇成线,汇成浪。她起身,唱起来。

至今我也不知道她唱的是什么歌,我记住了那旋律、那音调、那婉转忧伤无法言说的情绪。那是她家乡的歌,那是她的心在歌唱。后来我便调侃她:潘多不善于说话,只会唱歌。

例外终于出现。临结业前,有一段,原本约好的走路时间总不见潘多。问及,她才说,她的一个女友从西藏来,因为生病,在北京寻医。女友的病诊断出来,却找不到好的治疗办法。上课之余,她便陪女友继续寻医。有一天,我们终于又一起走路,那天的潘多异样极了,一圈又一圈,一直是她在说,说她的女友……

那个雪天,她一早从外面回来,天还没亮。

她说,女友走了,回西藏去了,她去送女友。

病呢?没法治,回去慢慢养。

说罢,她又恢复了惯常的沉默,不多出一个标点。

我却看见她眼睛里,星星点点的光,轻轻柔柔地闪。

鲁院结业回来,读潘多的小说,再度印证了我对她的感受:她的沉默不是回避,不是坚硬也不是拒绝,也不是天生沉默寡言,而是有一个世界,存在于她的内心。那个世界太完整太丰富太清晰,沉浸其中,她便无暇他顾,也无需他顾。相反,为了在那个世界里更深更透地沉浸下去,她需要屏蔽外部的喧嚣,只用自己的方式与外部连结。

潘多的小说,正如她自己所言,她书写着一个真实的、生活的西藏,一个有血有肉、充满着烟火气息的西藏。在她的小说世界里,有以普村为代表的西藏乡村,有以普村为视角的对城市的向往和抗拒,有热烈淳朴挣扎纠结的父老乡亲,有天灾人祸成功失败坚守逃离苦难奋斗……尽管应有尽有,但我还是从潘多的作品中读出了她的着力点,那就是她的那些姐妹,那些同族女性。那是她小说世界的核,是她打量世界的界。

从潘多的小说里,我还读出了那个从高原深处山村里缓缓走来的女孩,她站在某处,远远地望着前方的城市,她的胸腔里有一条汨汨奔涌的河。她决意前行,却充满着惧怕。城市的繁华精彩与她背囊里沉沉的故乡随时随地撕扯着、争夺着她。她无法融入,又不甘后退,便只能选择挺住。支撑她挺住的,就是她借用小说里阿妈对她说的话:清贫时,没有贪念的人很多,看着邻里都富了,还能克制贪念,就是圣人啊。

心放平了,路就直了。

也是她对阿妈说的话:即使我的身体到了城里,我的心也会在普村留着。

因为有普村,潘多的世界便始终有着流淌的声音,只是别人听不见,便以为她沉默、寂静。

她的强大是罕见的。

双重考验中,她们灵魂的焦灼与困惑。现代化给农村带来了一些变化,但与此同时也给人们的精神以很大的冲击。贫瘠的现实与都市生活的繁荣,给女性以很大冲击。尼玛潘多以细致的笔触描写了在时代变化中的三个女性命运的悲欢,融注了她对女性生存、民族困境的思考,她的写作没有局限在女性狭小的个人情感的天地,而是将女性的命运与民族发展的特定背景联系在一起,从而具有较为深广的历史内涵。

尼玛潘多拒绝对西藏神秘化的表现,她说:“我只是想讲一个故事,一个普通藏族人家的故事,一个和其他地方一样面临生活、生存问题的故事。在很多媒介中,西藏已经符号化了,或是神秘的,或是艰险的。我想做的就是剥去西藏的神秘与玄奥的外衣,以普通藏族人的真实生活展现跨越民族界限的、人类共通的真实情感。”她的一系列作品秉承现实主义道路,揭示西藏当下生活中普通人生存的困境和他们的精神追求。《城市的门》是小说《紫青稞》中的片段,着重刻画桑吉到达城市,经历了各种痛苦,写出了城乡差别和女性所要忍受的生存之痛。《琼珠的心事》写农村姑娘琼珠去拉萨参加了一场体育大赛的开幕式,暗恋上舞蹈指导,回到农村后她陷入暗恋的无望痛苦中,受到家人和村中人的冷嘲热讽。终于有机会再次进城进行藏戏表演,然而琼珠才知道,她暗恋的舞蹈指导已经结婚。作品写出了城市与农村的隔阂,写出了女性内心隐幽的世界。《协噶尔村的央宗》写央宗的丈夫从牧区带回来一个女人,这对倔强的央宗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在央宗的丈夫要带这个女人回牧区老家的时候,央宗诅咒了丈夫,丈夫因翻车死去。后来央宗明白了这个女人并不是丈夫移情别恋,而是为了信守承诺照顾他恩人的妻子。等明白这一切的时候,央宗十分痛苦,她想不明白丈夫为什么不告诉她这一切,也为自己诅咒丈夫而后悔不已,决定出家为尼。《针尖上的日子》写的是一个从小县城调到拉萨来工作的女子的心路历程,来到城市,面对人生地不熟、面对工作和情感的困惑,她承受着很大的压力,犹如在针尖上过生活。这些短篇小说都涉及到女性的生存之痛,她们在现实中的苦苦挣扎,作品对女性内心隐幽世界的描写细腻而又真切,有着感人肺腑的力量。

西藏是一块文学的沃土,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藏以其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走向中国文坛的前沿阵地,虽然在90年代以后文学创作一度趋于平静,但藏族作家一直没有停止对艺术手法的多样化探索。尼玛潘多吸收着现代主义的营养,然而她又秉持着现实主义文学精神,不仅在深入细致地观察和表现生活上显示出了冷静而理性的成熟态度,而且在人物塑造、细节描写和主题开掘等方面,表现出难能可贵的探索精神。她的创作在伦理精神和宗教传统的处理方面,包含着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她关注现代化进程中普通农民的生存困境和他们的苦苦挣扎以及在苦难之境中为了生存和尊严所付出的努力,她深刻地表现着特定时代特定人群的生存困境以及人们在这种困境下对生命的激情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洋溢着一种鲜活的生命力,这使得尼玛潘多的作品犹如雪域高原上的紫青稞一样,独特地存在,充满勃勃的生命活力。